洗澡

刘庆邦

在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我整个冬天都不洗澡，一回都不洗，过年也不洗。冬天的水塘里结了厚厚的青冰，乡下又没有澡堂，去哪里洗澡呢？开玩笑！别说冬天了，到了秋天秋水一凉，或到了春天春水还没有发暖，我也不洗澡。也就是说，一年四季，我三个季节都不洗澡。别说洗澡，我连手和脸都很少洗。

家里的大人比较顾脸面，冬天做早饭，母亲在锅里馏馍蒸红薯时，会顺便蒸上一瓦碗清水。早上吃早饭之前，母亲把余温尚存的水倒进一只铁盆里，供家人洗脸。因水比较少，倒进铁盆里只能盖住盆底，用双手都捧不起来。母亲的办法，是把铁盆靠墙仄棱起来，把水集中在盆的一侧，这样大人们洗脸时才能把水撩起来。小孩子的脸也是脸，大人们洗过脸后，有时也会让我们小孩子洗一洗。等祖父、父亲和母亲洗过脸，铁盆里的水已变得黑乎乎的，稠嘟嘟的，而且水所剩不多，已经发凉，我们都不愿意洗。往往是，在父母的严厉催促下，我们才不得不蜻蜓点水似的把脸洗一洗。我们用手指蘸着水，只擦擦额头、鼻尖和脸蛋，别的地方一般都不涉及。我们这样做，像是应付父母，也像是应付自己。应付的结果是，久而久之，我们的耳朵后面，下巴底下，还有脖子里，都积攒了一层黑黑的灰垢，如表皮上面结了一层皴裂的鳞片。大人笑话我们，伸手想摸摸我们的“鳞片”。我们护痒，赶快跑开了。

我们在天冷的时候好几个月不洗澡，当然也不洗头。这可便宜了头发丛中的那些虱子，它们的生活不会受到任何打扰，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黑色的头发上下出成串白色的虮子，并孵化出它们的子子孙孙。高兴起来，有的虱子会爬到我们头发梢的梢头，在高处把酒临风，出尽风头。

好了，麦子黄了，知了叫了，夏天到了，我们终于可以洗澡了。我们甩掉了鞋子，脱光了衣服，一扑进水里就舒服得嗷嗷乱叫，好像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狂欢季。在整个夏季，如果天不下雨，我们每天都会去水塘里洗澡。往往是刚吃过午饭，我们把饭碗一推，赤脚跑过村街上被太阳晒得烫烫的地皮，就成群结队地扑进村外的水塘里去了。我们把洗澡说成抹澡，我们的抹澡，一点儿都不追求什么讲卫生的意义，就是一味地玩水，在水里瞎扑腾，做游戏。我们互相往对方脸上泼水，比赛潜在水底扎猛子，玩“鱼鹰捉鱼”。我们刚下水时，吃面条吃得肚子都圆鼓鼓的，在水里扑腾上一气，两气，肚皮就瘪了下去。我们的手指肚先是泡胖了，接着又泡得出现麻坑，还是不愿意上岸。大人吃过午饭都要午睡，没时间管我们，我们正好可以放开手脚，把清水玩成浑水。刚开始脱光衣服下水抹澡时，因捂了一秋，一冬，又一春，我们每个人都是白孩子。我们抹澡才抹了一次，身上所有的“鳞片”就消失了，露出皮肤的本色。可是，我们连续抹澡一段时间，由于水泡、风刮、日晒，很快就变成了黑孩子。大人用指甲在我们黝黑的胳膊上划一下，马上就会出现一道白印儿。

万没有想到，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洗澡，是发生在首都北京。1966年11月下旬，还不满十五周岁的我，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到了北京。我们被安排住在北京外语学院的接待站里，负责接待和管理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解放军现役军官。我们住下后，他没有马上安排我们吃饭，说必须先把个人卫生打扫一下。我们低头把自己身上穿的黑粗布棉袄和黑粗布棉裤看了看，不知道个人卫生指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怎样打扫。这位军官把我们领到一个地方，我们一看才明白了，打扫个人卫生指的是让我们洗澡。

好嘛，好几个月没洗澡了，到北京先洗洗澡也是好的。可是，说是让我们洗澡，澡堂里却没有水塘一样的大池子，只有周边的墙壁上方，安装有一些倒挂的莲蓬头儿，水是从那里滋出来的，跟下大雨一样。我脱光了衣服，看看别人怎样拧下面水管的旋钮，我也怎么拧。长这么大，我这是第一次在冬天洗澡，第一次在室内的澡堂洗澡，第一次用热水洗澡，是三个第一次吧。澡堂里水雾腾腾，我想莲蓬头里滋出来的水一定很热乎。尽管我有这样的思想预热，可当我把水管拧开，当如注的水猛地浇在我身上，我还是吓了一跳，赶紧跳开了。乖乖，这水太烫人了，这样烫皮的水，褪鸡毛还差不多，倘是连续浇在人身上，不把人皮烫掉一层才怪。旁边一个有经验的、正洗澡的人告诉我，下面两个旋钮，一个管热水，一个管凉水，要把两个旋钮儿都打开，把水温调节一下才能洗。他指出，我只打开了冷水管，是不能洗的。怎么，一个从没洗过热水澡的我打开的是冷水管，而不是热水管？我把手伸进莲蓬头儿里滋下来的水柱里试试，可不是咋的，上面下来的水的确是冷水，冰冷冰冷的水，而不是热水。可能因为冷水对皮肤同样有刺激作用，我就误以为是热水。这就是一个第一次进城洗热水澡的土老帽儿所闹的笑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关于洗澡这个话题，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要无话搭拉话哟！没问题，还有的说。后来我参加工作后，每天都要洗澡，不想洗也得洗，哪怕把皮搓薄也要搓，好像洗澡是每天的必修课，不修就无法见人。那么我参加的是什么工作呢？告诉您吧，是当被称为“地下工作者”的煤矿工人。我们在煤窝里滚上一个班，头黑了，脸黑了，身上全黑了，连耳朵眼儿里和鼻孔里都钻进了煤，由一个黄人像是整个变成了黑人。这样的形象，我们不洗澡能行吗？怎么去食堂吃饭呢？怎么上床睡觉呢？怎么在矿区走动呢？怎么以本来面目去面对矿上的那些珍稀的女工呢？所以说，出得井来，第一要务，是一头扎进澡堂里，好好把澡洗一洗。其实洗澡也是个力气活儿，在井下干一班下来，我们累得有些精疲力尽，似乎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我们会洗得潦草一些，煤尘洗去了，沾在眼睑上的煤油却没有洗掉，洗完回到宿舍拿小镜子一照，眼圈还是黑的，像熊猫眼，好玩儿！尽管如此，当矿工时间长了，我们洗澡就养成了习惯，一天不洗就不得过。特别是冰天雪地的冬天，班前我们一穿上沾满煤泥的劳动布工作服，简直像穿上冰甲一样，冰得直打寒颤。从穿上“冰甲”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盼着早点儿结束一班的繁重劳动，好升井洗一个热水澡。因井下充满凶险，我们有时难免担心，今天夜里下井，到天明时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洗个热水澡。当我们从几百米深的井下出来，把身子泡进煤矿特有的大大的热水池子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又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人生胜利。

人活着走来走去，说不定会走到哪里。我没有想到，我第一次洗热水澡是在北京，后来转来转去，竟有幸调到北京工作，成了一个在北京落脚的居民。我1978年春天调来北京，至今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多年。做什么事情变得比较容易，成了日常生活，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调到北京后，先是到街道上的澡堂子里洗澡，后来在家里安装了电热水器，在家里就可以洗澡。再后来，热力厂的热水直接供应到居室的卫生间里，不管春夏秋冬，开关一开，洗浴用的热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另外，北京的城内和郊区还建有一些温泉城，想在蓝天白云下面泡一泡露天的温泉，随时都可以去。

一路走来，好在我没有忘记过去，没有忘记少年时代一年三季洗不上澡的经历。长大后我才知道，生命来自水，水与生命相伴，生命与水有着紧密的联系。像月球、火星、木星等星球，就是因为上面没有水，才不能生长具有活泼生命的生物。从这个事实上说，水对人的生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或者说水就是人，人就是水。我还从书上看到，一个人一辈子用水多少，决定着这个人的幸福指数，用水多，幸福指数就高，用水少，幸福指数就低。这个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但不知为何，这样的说法却让我产生了警惕和忧虑，我担心它会影响人们的心理，造成用水攀比，继而造成对水的挥霍和浪费。我们还是要珍惜水，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2021年10月26日于光熙家园

“文汇笔会”
微信公众号

此心安处

——上历博/上革博市民捐赠展展品释读

胡宝芳 彭晓民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南京西路325号的新馆开放以来，藏品征集工作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最近推出的“此心安处——上历博/上革博市民捐赠展”，展出近年来各界市民捐赠物品63组114件。现释读几件重要展品，与大家分享。

戴戟印鉴《资本论》（1953年版）

此为“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戴戟先生遗物之一，由其外孙、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沈坚十多年前捐赠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图①）。此套图书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上有戴戟本人印鉴及批注。

戴戟是一位曾在上海生活、战斗过的爱国军人。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1932年第一次淞沪抗战期间，戴戟与蔡廷锴、蒋光鼐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抗日通电，带领上海军民经过近四十日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狂言。1933年戴戟参加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解放战争期间，戴戟在上海参加陈铭枢等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革前身），从事反蒋活动。他曾协助中国共产党策反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戴戟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根据组织安排，戴戟离开上海赴安徽任职。1973年戴戟病逝于安徽。

展厅中的这套《资本论》共三本，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上不但有他本人印鉴，还有他密密麻麻的阅读笔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戴戟真诚服膺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他力求与中国共产党同频共振，同心同行。为了改造自己旧军人思想，跟上时代步伐，他自觉学习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努力在思想上向党靠拢。生于1895年的戴戟读这套《资本论》时，已年近六十。但他认真学习中共奉为经典理论指导的《资本论》，反映出一个爱国军人与时俱进的思想轨迹和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戴戟认真阅读、珍藏、遗留的《资本论》，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凝聚力、影响力。

“海内争传医国手”对联

此书法对联为民国上海名贤狄平子赠予上海名医张蔚孙的礼物（图③）。十几年前，张蔚孙儿媳祝蕙韵女士捐赠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张蔚孙（1895–1948），为海上名医世家第十一代传人，张蔚云之孙。张氏家族宋代从四川移居上海，明末张元鼎弃儒从医。上海张氏中医内科以治疗热病、内科杂病而闻名于世，多人被《上海县志》《上海通志》《上海卫生志》等上海地方志书收入。1980年代曾任上海中医学院副院长的张伯讷教授，1995年荣获首届“上海市名中医”称号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镜人教授等均为张氏后裔。

张蔚孙自幼好学善问，曾受父亲张鞠乡、叔祖张骧云及堂叔张若星教诲，博采众长，医术高明。张蔚孙三十岁左右即名满申城，据说当年甚至有俄、印、日、朝等国人慕名而至。民国著名中医丁甘仁、陈莲舫遇到伤寒重症病人时，常召张蔚孙会诊。名医谢利恒与张蔚孙交往最为密切，两人常常一起切磋医技。同为名医的沈芝九（妇科名医）、黄宝忠（外科名医）等患病时，医不自治，曾得张蔚孙医治。张蔚孙不仅医术高明，医德也很高尚。“生平活人无算，从未多索诊金。遇贫困者，资助勿啬”。张蔚孙不仅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还擅长医学理论研究和中医理论传承。1933年，张蔚孙被中央国医馆上海分馆馆长陆仲安聘为该馆学术研究委员。中央国医馆是一个中医学术团体，旨在促进国医条例的制定、拟定学术计划，组织国医研究机构，出版刊物等，在中医领域具有很高学术权威性。张蔚孙不到四十岁即被聘为委员，可见他在上海中医领域的地位。

该对联书赠者狄葆贤（1873–1940，一说1941年），字楚青，号平子，斋名平等阁主人，为近代上海名贤。清末，狄平子曾随康有为、梁启超参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他于1904年来沪创办《时报》。狄平子还创办有正书局，专门印刷珂罗版碑帖书画。此外，狄平子还创办了《妇女时报》《小说时报》，著有《平等阁诗话》《平等阁笔记》等。50岁后，狄平子健康欠安，他摒弃俗务，礼佛之外，书画自娱。狄氏书法作品多以行书为主，结体瘦硬，多用藏锋，俊瘦而内敛。狄平子生前所作诗、书、画，人称三绝，得其真迹者，莫不视同拱璧。

从张蔚孙、狄葆贤二人生平、经历看，此对联赠送时间在1920–1940年之间。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病人常以感谢信外加贺仪的方式表示谢忱。张家至今珍藏民国期间病家赠送贺礼多种，此份木制贴金对联仅为其一。

陈望道签发中华艺术大学毕业证

此份毕业证书是2010年关紫兰女士逝世25周年之际，她的长女梁雅雯暨外孙叶奇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捐赠的关紫兰遗物之一（图②）。该毕业证书为陈望道1927年以中华艺术大学主席身份签发。

关紫兰是谁？在近代中国美术界，关紫兰与方君璧、蔡威廉、潘玉良有美术留学“四杰女画家”之誉。1963年起，她成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2004年12月版《上海美术志》曾记载过这位生于上海、长期活动在上海的女画家：

关紫兰（1903–1985），现代画家，广东南海人，世居上海。1927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科，师从陈抱一，同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文化学院美术部，在日本五年间，曾举行个人油画展。油画《水仙花》……是中国女画家的作品首次在日本入选展览。关紫兰留日归国后，曾受聘中华艺大任教，并在华安大楼两度举行个人画展。她的两幅油画被收进日本出版的《世界名画集》。她的油画作品较早地接受野兽派画风影响，清新、洗炼、秀丽。新中国建立后，创作有不少反映新生活的油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市和全国性美展，有四幅油画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关于关紫兰毕业于中华艺术大学之事，1927年6月的《良友》第17期第23页曾刊发《中华艺大展览》图文。在此页图文中，《良友》编辑刊发了中华艺术大学举办的师生作品展部分作品，中华艺术大学“本届优等毕业生关紫兰”的人像及其作品《悠闲》位于突出位置。1930年《艺友》第5期曾介绍关紫兰，称其初修业于神州女学洋画专科，后转入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科，民国十六年夏毕业后，即东渡继续研究。

中华艺术大学的成立时间，曾有1929年与1925年两种说辞。关紫兰1927年6月获得毕业证，可知中华艺术大学1929年成立之说有误。此外，1925年12月30日《新闻报》曾刊载《中华艺术大学成立宣言》，该宣言由中华艺术大学行政委员会陈望道、陈抱一、丁衍镛、黄鸣祥、王陶倩，学生代表罗通化、孙仙龄发出。同日《时报》载中华艺术大学已于前日宣告成立。1925年12月30日《新闻报》《时报》相印证：中华艺术大学应该是在1925年12月底成立的。关紫兰毕业证是在1927年发的。那么，中华艺术大学1929年成立之说，无论史证还是物证，均不成立。曾任职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王锡荣老师的《中华艺大史实再探》同样持此论点。历史、实物二重论证，中华艺术大学以1925年底成立为确。

关于陈望道在中华艺术大学的时间、职务，《中共党史人物传》《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文化源流辞典》等录：陈望道1929年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但在关紫兰1927年6月中华艺术大学毕业证上，陈望道以中华艺术大学主席身份签字，他的职务称呼并非校长，与中华艺术大学发生联系也早于1927年6月。

1925年12月的《民国日报》《新闻报》《时报》，报道中华艺术大学成立时均提到：中华艺术大学“校中不设校长，即以行政委员会治校，即现在我们委员，已经推定陈望道、陈抱一、丁衍镛、黄鸣祥、王陶倩，职员亦已举出委员会主席陈望道，秘书兼教务主任丁衍镛、事务主任兼会计黄鸣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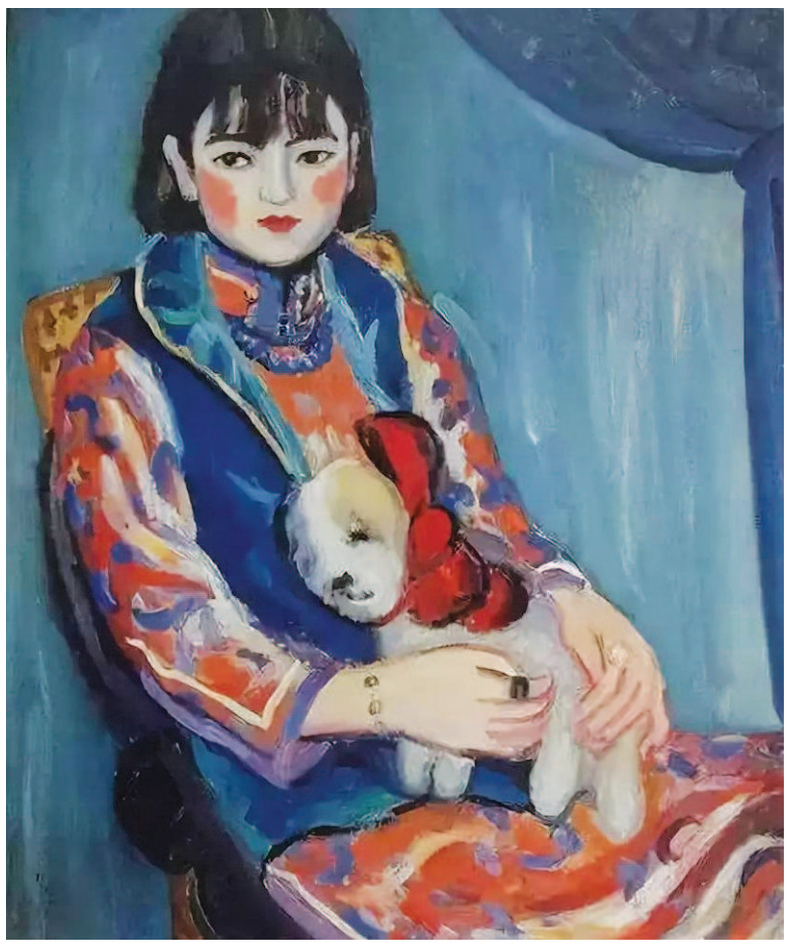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合影

1953年10月4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合影原件，是2009年魏鹤龄子女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捐赠的魏鹤龄遗物之一。

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代表、列席代表近八百人，此次会议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明确在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创作为主。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代表。此次会议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文联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委员会，由103位全国委员组成，并选出21位委员——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郑振铎、夏衍、柯仲平、老舍、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洪深、阳翰笙、蔡楚生、袁牧之、齐白石、江丰、吕骥、马思聪、陈沂、巴金——组成主席团，主席郭沫若，副主席茅盾、周扬，秘书长阳翰笙。中国文联是全国文学艺术团体的联合组织。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等都是它的团体会员。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1953年9月27日，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10月4日该会通过决议，将“中华全国剧协工作者协会”改名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简称中国剧协），选举田汉为主席，欧阳予倩、梅兰芳、洪深为副主席。魏鹤龄子女捐赠的合影，拍摄时间正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正式定名那天。大会编发的会议资料中有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会理事名单，其中就有魏鹤龄。

魏鹤龄，1907年生于河北，1920年代为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高材生。1932年加入红十字会救护队来到上海，并开始了他的电影、戏剧生涯，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后来作为抗日救亡演剧队的成员转战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参与了《长空万里》《中华儿女》《塞上风云》《正气歌》《大地回春》《胜利号》《花溅泪》等多部电影、话剧。1948年魏鹤龄回到上海，参与拍摄《乌鸦与麻雀》。该片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中国优秀影片奖，魏鹤龄获得个人一等金质奖。1957年，巴金的《家》被搬上银幕，张瑞芳、黄宗英、孙道临、王丹凤、程之、宣景琳……群星荟萃，魏鹤龄扮演高老太爷。1995年世界电影一百周年、中国电影九十周年之际，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等四部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中国“电影世纪之星”颁奖大会，魏鹤龄被追授“世纪之星”光荣称号。同年，魏鹤龄被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列为“中国电影百年百名优秀演员”之一。



L女士像（油画）关紫兰